“一带一路”：大谋略与大智慧

——《习近平时代》选载

□［美］熊 玠 主编

亚投行，只是习近平外交攻势的小试牛刀。作为一个力图将中国推向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领导人，他有着更宏大的战略：“一带一路”。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正如邓小平在形容中国改革开放时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也有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

“向西开放”

最先亮相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9月7日上午，习近平前往西部邻国哈萨克斯坦访问，他在以哈萨克斯坦总统名字命名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想。

他对哈萨克斯坦的学生说，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

张骞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公元前164年，他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遣，去西域联络与匈奴有仇的大月氏族，共同攻打中国北部的强大匈奴帝国。这趟旅程异常艰险，张骞本人也被匈奴扣留，很多年后才到达西域。虽然大月氏族拒绝联盟，但张骞被认为是开辟丝绸之路的第一人。

这条道路经中国的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中亚的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河中地区，然后是西亚的伊朗，并向西通往欧洲。它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后来则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一条主要商路和交往之路。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并被广泛接受。

“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一大贡献。根据一些语言学家的研究，中国一词的英文翻译（China），很可能是来源于中文“丝”的发音，至于“china”在西方语系中又被译作瓷器，则是因为古代的瓷器，大多都来自中国。

习近平在这次演讲中说，“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哈萨克斯坦这片土地，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曾经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过重要贡献。”

“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诗情画意的背后，是这位领导人的伟大构想。如果说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国东部的大门，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习近平则开启了向西开放，实现中国经略中亚乃至西亚、欧洲的伟大抱负。这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在习近平看来，今天的欧亚地区，贸易合作蓬勃发展，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经济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可大有作为。从贸易方面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从交通来看，丝绸之路东部有中国，西部有西欧，如果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将盘活整个中亚、西亚和东欧市场。

而且这一举措也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习近平说，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本币结算方面开展了良好合作，取得了可喜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一好的做法有必要加以推广。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换言之，这个经济带建设，也将助推中国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的西北地区以及西藏显然可以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并因此获得发展新动力；中国的东南和西南地区，习近平则为它们规划了一个新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在这条道路上，从2000多年前开始，大量装载着中国丝绸、瓷器等货物的商船从中国港口出发，途经马六甲海峡，最后到达印度、阿拉伯和非洲的港口。2007年，中国曾打捞出一艘完整的1000多年前的古商船，上面载有数千件珍贵的瓷器，整个商船的文物价值，估计在千亿美元。

习近平曾长期在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任职，隶属福建的泉州，被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时很多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摩尼教徒都曾来这里定居。《马可·波罗游记》曾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习近平意在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加强中国同东南亚的联系。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提出这个概念之前，习近平说，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支持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可以这样说，亚投行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助推器，它将帮助中国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致力于实现沿线参与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表明习近平的眼光显然超越了经济，而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格局。他精心推出的这个设想，是一个极其宏大的战略，不仅有助于平息外界对中国崛起的猜疑，并很可能改变未来世界格局。

从经济角度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表现平庸，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曾用了一个新词来形容：新平庸时代（a new mediocre）。这个时代的主要特色，概括而言就是“脆弱、不均衡并被风险所困”。

全球经济最大的难题，就是需求不足；最大的困扰，就是资金过剩。“一带一路”将带来庞大的亚洲基础设施需求，涉及铁路、公路、桥梁、能源等数百个项目的重大工程。世界各国将可望与中国分享发展的经验和成果，从而实现经济繁荣。

更主要的是，这一计划将带给中国更多的伙伴和朋友。一个大国，总需要有多个国家相支持。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里，除了巴基斯坦被中国人称为“铁杆朋友”外，很多国家都曾与中国发生过矛盾，俄罗斯、越南、印度与中国还发生过激烈的边境军事冲突。

“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量亚洲国家将会全面对接中国的发展战略，它们可以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从中国经济繁荣中获益；同时，它们也向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中国标准也将进入这些国家。

以习近平经常提到的“互联互通”为例，“互联互通”不是只有工程建设，而是包含三个方面：既包括以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为基础的“硬件”建设，又包括以制度、规则衔接融通为基础的“软件”建设，还包括各国之间人员的跨境往来与交流，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的三位一体。

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时，习近平就直言不讳地说，当前世界经济融合加速发展，区域合作方兴未艾。换言之，习近平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世界，不是单个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把欧亚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所有国家“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这正是习近平对世界的贡献所在，他正在改写国际经济秩序。因为在过去，世界都是以西方为中心。而“一带一路”鼓励中国向西开放，将带动中国西部以及中亚、蒙古国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放，改变这一地区贫困、动荡的“经济洼地”面貌，进而摆脱恐怖主义、战乱丛生的状况。

英国做不到的，苏联没做到的，美国不想做的，中国正在努力做。

经济上的融合、金融上的便利，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友好。这些国家将成为中国的亲密盟友。换言之，中国终于在21世纪恢复过去曾有的荣光，它将成为亚洲的中心，拥有广阔的“后院”，这些国家也将从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上获益。

破解美国的围堵

在古代东亚，作为中央王国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的是一种“朝贡体系”，即中国的皇帝是“内服”和“外服”的共主，称之为天子。天子在王国的“内服”（即中国）进行直接的行政管理，对直属地区之外的“外服”（即藩属国），则由天子册封这些地方的统治者进行统治。“外服”统治者承认中国皇帝的领导地位，皇帝则颁发给他们印玺，承认他们的合法统治权。在今天的日本、朝鲜、越南的博物馆里，都可以找到来自中央王国的印玺。

为显示作为中央王国的富有与大度，中国皇帝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对朝贡者给予大量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所以，各藩属国总是乐于对中国朝贡，甚至有时对中国限制它们进贡，持非常不满的态度。

这种不同于殖民地与被殖民地的关系，在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后被打破，中国的很多臣属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中国自身也几乎被瓜分。

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被西方称为“中华帝国主义”的朝贡体系，其实更类似于自由贸易体系，也凸显了东方文明的智慧。现代国家显然不会重复这种体系，但其中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理念，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

酷爱读书的习近平，显然认识到中国先人的智慧。他高度重视周边外交，认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这其实也是在对冲美国重返亚洲给中国造成的战略威胁。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增强，同时不断发展的军事实力也扩展到东海和南海岛屿。

美国出于防范和遏制中国的目的，高调宣布重返亚洲，通过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得周边一些国家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在一些领土争端问题上挑战中国，造成中国与周边国家争议摩擦不断。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看来，习近平的破解之法，就是在坚持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的前提下，抓住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积极谋求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谋求稳定。

也正是根据这一战略布局，中国主导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亚投行和丝路发展基金，促进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构建以合作发展为基础的命运共同体。在黄靖看来，“习近平重道义、讲原则、求公平、谋共赢，牢牢把握国际事务中的道德制高点，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但也绝不为一己之私伤害他人。”

参考与建议

县委书记怎么看 “为官不为”

在县委书记们看来，当前，领导干部“为官不为”现象虽然只是个别和局部现象，但如不加以整治，很容易形成“传染病”，势必会向上下左右弥漫，直接影响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耽误党的事业。

□ 郭焕永 邱继兴

作为基层工作的“关键少数”，县委书记肩负一线工作重任，他们是怎么看“为官不为”现象的，值得我们关注。近期，我们在中央党校部分县委书记学员中通过座谈会、深入走访、互相谈心等多种形式，对当前干部中存在的“为官不为”现象进行了一些探讨。

“为官不为”的主要表现

“为官不为”是党员干部对待自己工作的一种不作为现象，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隐蔽性，在县委书记们看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患得患失“不敢为”。凡事先替自己打算，患得患失。一怕舆论聚焦成热点。有的干部不习惯自己和自己的工作置身于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监督下，怕一些小事被无限放大，成为公众和舆论的焦点，畏首畏尾、缩手缩脚，有损自己的形象，影响升迁。二怕出现失误担风险。有的干部把“不出事”作为最大原则，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对工作墨守成规，敷衍应付，得过且过，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该改的不改，满足于当四平八稳的“太平官”。三怕触及利益得罪人。有的干部不敢表态、不敢拍板，不敢提出自己意见，担心引火烧身、承担责任，只愿做“和事佬”。

能力不足“不能为”。一是“不学习”。有的干部信奉关系第一，钱财铺路。平时不看书、不愿主动接受新事物、新理念、新观点，甚至持排斥态度。有的表面上讲要学习、要提升，实际上是“一根筋”，凭经验办事，仗好恶决策，工作思路不清、效率低下。二是“没办法”。有的干部能力低，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是拿不出办法、想不出对策，甚至将问题推给他人，“这事比较麻烦，不好办”，“等一等再说”成了一些干部的口头禅。三是“乱指挥”。有的党员干部在任务压顶、形势逼人的情形下，硬着头皮上，盲目决策，胡乱指挥，错失了机会、贻误了发展，带来了麻烦。

安于现状“不愿为”。有的干部觉得现有地位来之不易，把干事与反腐对立起来，认为现在没有不当手段干不成事，“一动不如一静”。一是“守摊”思想，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求争先恐后，但求不出差错。尤其是有的任职时间较长的干部，觉得自己该歇一歇、停一停，只要安全着陆就好，不愿干事、不愿多干事。从调查情况看，这种“守摊”思想甚至在一些三四十岁、正值壮年的干部中都有存在。近期，网上披露的某县十余名科局长主动要求辞去实职任虚职，就是一个佐证。二是“推诿”作风，遇到问题能推就推，能躲就躲，能拖就拖，存在“办不了，推得了”、“推不了，躲得了”、“躲不了，拖得了”的现象。三是“畏难”情绪。一事当前，前怕狼后怕虎，说起困难时“千难万难”，躲避困难时“千方百计”，对矛盾、对棘手难题总是上交下派，左推右搡。

夸夸其谈“不真为”。有的干部热衷于玩虚的一套，一方面，对上拍胸脯，对下拍屁股，只出经验不出成效，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以会议落实会议，以会议推进工作，用开会来显示自己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来体现自己的工作态度。是典型的“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另一方面，只求显绩，不求潜绩。有的干部忙于自我设计“升迁图”，缺少正确的政绩观，为了在升迁节点出成绩，不顾客观实际，忽视群众意见，忽略群众需要，搞一些“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表面上忙忙碌碌，实际上毫无效率，浪费了资金资源，留下了一摊烂尾工程。

如何整治“为官不为”

在县委书记们看来，当前，领导干部“为官不为”现象虽然只是个别和局部现象，但如不加以整治，很容易形成“传染病”，势必会向上下左右弥漫，直接影响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耽误党的事业。县委书记们结合工作实践，提出了几点建议。

全面加强素质能力建设。具体来说：一是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岗位党员干部的实际需要，探索开展分层、分类教育培训的新路子，增强干部培训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二是通过一线锻炼、干部压岗和轮岗等方式，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有计划地把干部放到各种岗位上去磨练，切实解决干部能力提升渠道单一的问题。三是在使用干部时，要把有能力、有业绩，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依据各自优势、特长，选配最有利于其能力发挥的岗位，为其提供施展才华的载体，充分激发干部潜在能力，做到人尽其能。

积极营造干事创业的氛围。党员干部就是干事的，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是党员干部想干事、敢干事、抢着干事也能干成事的根本保证，这是一个地方发展最大政治基础。一是倡导价值认同，凝聚共同愿景。整体上来看，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有着坚强的理想信念，要用对党的路线方针的认同、工作思路的认同，来感化、来感染、来引领，激发他们对决策部署的认同，让广大党员干部怀有跃跃欲试、争先恐后的工作欲望和冲动。二是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惩治腐败，而且加大了信息通报广度和细度，使舆论媒体成为散发正能量、激励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推进器。

健全容错纠错的机制。大多基层在理解、执行中央精神中会有一个时空差，客观上存在一个“看齐”的节奏感，基层干部条件艰苦、压力很大，干事创业不容易，难免会有委屈、失误甚至犯错。如果让想干事、敢干事的流血流汗再流泪，容易挫败党员干部干事的精气神。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就是为担当者担当，鼓励党员干部敢于作为，根除想做“太平官”怕犯错不作为的想法。对于想干事、敢干事的党员干部，只要是在法律法规框架下推动工作的，要大张旗鼓支持他们放心干、放手干，让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平台，干成事的有奔头。当然，容错纠错机制不能代替问责，也不是不要问责，是既要问责，又要营造宽松干事环境。要重点针对各种“为官不为”的不良表现进行监督、检查和专项整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向干部不作为亮剑，让干部不敢懈怠、不敢失责。当然，追责制度的核心是权责对应、权责平衡，即有权必有责，建立“问责人人平等”的问责机制，权力越大其所肩负的责任也应该越大。



涵养勇于担当的精神。要实现“为官有为”，首先就需要培养干部强烈的担当精神，在各自岗位上激发全部能量。一方面，坚定政治信仰。政治信仰是自觉讲政治、顾大局、勇担当的一个重要前提，党员干部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就有什么样的权力观、政绩观、群众观。要积极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加强理论修养、牢记党的宗旨、持续党性锻炼，认真体悟、反复教育、经常提醒、持续激励，不断坚定政治信仰，时刻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坚持以上率下。面对崇高的使命和繁重的任务，党员干部要善于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机关做基层的表率，领导做干部的表率，党员做群众的表率，从而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形成勇于担当的良好局面。

完善奖惩机制。要让有为者有位、有威。科学建立干部考核测评体系，把握好干部“能上能下”要求，要把“狮子型”“黄牛式”的干部用起来，让有激情者有机会、能干事者有舞台、守规矩者不吃亏，提振精气神、激发正能量。要结合工作实际，创新以状态测评为主体、干部考察甄别和干部交流等配套的“1+X”工作绩效测评体系，对考核优秀的干部优先提拔使用，对排名靠后的干部进行诫勉谈话、任职调整，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力，有效激发干部干事热情。从基层的实践来看，建议要赋予上级给下一级激励的一定空间。主要是在对下级的奖励方面，能按照层级管理的要求，给予上级一定权限，对下级进行物质方面的奖励，便于上级调动下级工作的积极性，也给下级推动工作带来一定的干劲和动力。

增进人文关怀。一是政治上激励。要为干部搭建成事、成才、成功的平台，切实增强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促使优秀党员干部脱颖而出；要严格考评，真正用好考评结果，把对优秀党员干部的激励政策落到实处，形成良好导向，让党员干部有“为官有为、有位”的盼头。二是工作上支持。只要是利国利民，不违法、不违纪的事情，上级领导都要从精神上、实际上大力支持。三是生活上关照。特别对处于基层、边远、艰苦地区的干部和家里发生这样那样困难的干部要从多方面进行关心。四是心理上关怀。进一步健全交心谈心制度，搭建畅通、务实的交流渠道，经常性地开展面对面谈心活动，加强情感上的互通，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将心比心。上下级要互相信任，倡导人格上的平等，用平等的人格意识来激励党员干部，关注干部状态，关心干部成长，让干部都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安心、安身、安业。推动广大干部心情舒畅，充满信心，这样干部干事创业才会越来越顺，才敢积极作为，努力担当。